

# 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

吴 炜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已有的同胞结构与教育获得研究主要关注了由代际资源稀释所致的同胞竞争效应, 很少考虑同胞组内的资源生产与传递及其后果, 也较少探讨同胞的居住安排这一同胞结构维度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此, 研究以同胞支持为理论视角, 使用CEPS基线调查数据, 分析了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 并对其群体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在人口大流动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青少年与同胞不同住现象已经比较普遍, 有同胞的青少年中近三成未与同胞共同居住在一起; 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显示, 与同胞同住能够显著地提升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利用替换变量法和匹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显示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仍然存在; 机制分析表明, 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这一影响的中介路径, 与那些未能和同胞同住的青少年相比, 与同胞同住的青少年拥有更高的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进而提高了他们的学业表现; 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 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不存在阶层差异, 与优势阶层的青少年相比, 劣势阶层的青少年与同胞同住的教育效应并不存在差异。研究表明, 同胞之间的居住安排对青少年的教育成就乃至社会流动具有重要作用, 这意味着国家可以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促进家庭做出整体性迁移的决策, 达到促进青少年的教育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与同胞同住 居住安排 同胞结构 阶层背景 学业表现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5)01-0124-12

## 一、导言

近年来, 国家不断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从“双独二孩”政策开始, 历经“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 直至2021年实施“全面三孩”政策, 在对生育的行政限制不断放松将显著改变我国家庭中的同胞数量和同胞结构, 进而影响青少年的教育获得或者学业表现, 因此, 同胞结构与教育获得话题再一次引发了国内学界持续且热烈的关注。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 关于同胞结构和教育获得的关系, 学界的基本观点是同胞的存在对个体教育具有负面效应。布莱克(Blake)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被广为接受的解释理论——资源稀释假说: 家庭中父母为子女接受教育提供了必需的物质资源、机会资源和对待资源等家庭资源, 然而家庭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 当子女数量增加后, 每个子女所获得的教育资源会被稀释, 从而会降低子代整体的教育水平。<sup>[1]</sup>在资源稀释假说的总体框架下, 学者们

收稿日期: 2024-06-12; 修回日期: 2024-09-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教育获得中的同胞支持效应研究”(19YJC840044); “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南京理工大学)”项目

作者简介: 吴炜, 副教授, 社会学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

在同胞数量之外引入同胞性别、出生间隔、排行顺序等同胞结构变量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在多子女家庭中,同胞规模的扩大总是会稀释全体同胞或者部分同胞(如特定性别、特定排行等)的教育资源进而不利于其教育获得,同胞规模的扩大与个体教育投入和教育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这也被称为“同胞竞争效应”。<sup>[2]</sup>

然而,有关同胞结构和教育获得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资源稀释理论最令人兴奋亦是其被广为接受的一点是,它试图建立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理论的基础上。然而,纵观已有基于资源稀释假说的主要研究,都将上述各类资本所构成的家庭资源的来源局限于父辈和其他长辈,即对于同胞而言,家庭资源是固定的和外在的,兄弟姐妹更多的是争夺父母与长辈提供的代际资源,而几乎不能为个体提供资源支持。事实上,在解释同胞规模对教育教育获得的影响时,亦理应在同胞组内的资源竞争关系之外,引入同胞组内的资源提供角色的讨论。而已有研究大多将同胞与教育发展的研究集中于对代际资源的稀释所致的同胞竞争效应,很少考虑到同胞组内的资源生产与传递及其后果。其次,已有研究大都将同胞结构操作化为同胞数量、性别构成、出生次序和年龄间隔等几个变量,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同胞结构的其他维度。张帆和吴愈晓指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生产与传递都会受到地理空间的影响,生活在同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频繁互动能够产生新的家庭资本,加强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传递效率。<sup>[3]</sup>显然,本文所关注的同胞居住安排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同胞结构要素,对个体的家庭资源和教育获得具有重要的影响。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基于同胞支持的视角,聚焦于分析同胞的居住安排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试图回答与同胞同住如何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

业表现的效应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是否具有异质性?本研究在教育同胞竞争效应之外,明确地提出同胞支持效应,在理论层面有力地拓展同胞结构与教育获得的研究视野,并在实证研究层面予以验证,这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同胞结构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多重影响。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教育获得中的同胞效应

同胞结构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研究涉及了一个社会学的古老研究话题——不同的群体构成会有什么后果?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经典地位获得模型中,同胞数量就已经被作为家庭背景的重要指标纳入了视野,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几乎都聚焦于两者之间的负面关系,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理论解释中。一是“资源稀释”假说,认为在家庭总体资源的约束下,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分配到每个同胞的可利用的物质和非物质等资源就会减少<sup>[4]</sup>。即便在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对教育生效应的家庭资本种类会发生改变,但资源的总量总是相对有限的,同胞规模的扩大总是要减少个体所获得的资源。<sup>[5]</sup>与资源稀释理论相近的假设则是经济学领域中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sup>[6](P234-239)</sup>。二是群集理论,认为家庭智力环境解释为父母和所有兄弟姐妹的平均组合。由于父母的智力水平是最高的,新生儿的兄弟姐妹的智力总是最低的,新生儿总是会降低家庭的智力环境,从而不利于孩子的学习。<sup>[7]</sup>

上述两种理论导向下的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教育领域中同胞组内部存在着竞争效应。尽管如此,仔细分析还能发现,相关研究又已经比较隐晦地提出同胞之间存在着相互协作和支持,或者说扮演着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在对我国台湾的一项旨在验证和扩展资源稀释假说的研究中,建立了一个家庭内部转移模型,通过承认年长的兄弟姐妹支持年轻的兄弟姐妹的责

任,指出较早出生的哥哥姐姐提供资源供给弟妹妹求学,使得同胞组内较晚出生的孩子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他们不仅获得了代际的家庭资源,也获得了代内的资源转移。群集理论也假设年长的孩子从教导年幼的孩子中受益,<sup>[18]</sup>显然也暗含了同胞之间的人际互动对青少年教育发展积极影响的一面<sup>[9]</sup>。毋庸置疑,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人们最持久的社会关系,会在一生中影响和塑造个体。表现在教育发展中同样如此,手足同胞的存在对个体教育后果的影响可能是不好的,也可能是好的。正如费孝通曾指出:“同胞之间因为很早在同一合作团体中养成,也是最方便,最可能的合作对手。”<sup>[10](P249)</sup>目前来看,已经有研究开始讨论教育领域中同胞之间的资源支持及其后果,并将其称为同胞支持效应,<sup>[11]</sup>如张秀武对流动人口家庭的研究,<sup>[12]</sup>聂景春对西部农村地区的研究都发现,同胞规模的扩大也能给个体学习成绩、心理健康等带来积极的影响。<sup>[13]</sup>郑磊等则基于学业表现和心理发展两个指标,利用农村的抽样调查数据,也发现学业表现上拥有一个兄弟姐妹的青少年并不弱于独生子女,心理发展上非独生子女则更是显著好于独生子女。<sup>[14]</sup>

## (二) 与同胞同住和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关于与同胞同住如何作用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从同胞支持的角度看,主要的理论支持是交流互动论,该理论认为,同胞数量的增加扩充了个体交流互动的机会,同胞相互之间的交流、辅导、学习、竞争等促进了个体的学业表现和全面发展。<sup>[15]</sup>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兄弟姐妹是儿童早期社交活动的主要对象,同胞相处的时间比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还要长,他们必然会成为社会学家默顿所谓与自己有实际交往、具有稳定社会联系的同期群。当拥有兄弟姐妹后,频繁互动产生的家庭社会资本会在同胞内部产生形成一种积极的“规模效应”以及“反馈效应”,尤其是与同胞共同居住时,这一效应会得到有效放大。一方面,同胞为青少年提供了更多的角

色扮演和游戏的机会,有利于体验他人的社会心理、建立心灵理念、锻炼社交技能和语言能力,提升学业表现。在长期互动过程中,与同胞建立的依恋关系也会形成安全型的内部加工模式,他们会对自己、家庭以及外部世界持有更加积极正面的看法,促进其社会适应性的发展和社会化过程。<sup>[16]</sup>另外一方面,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学业表现优秀的同胞(尤其是年长同胞)为青少年提供了学习的榜样,能够发挥极强的社会比较和示范效应,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业表现,最终有利于提升所有同胞的教育获得。<sup>[17]</sup>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英国学者对20多万本国同胞组的教育发展研究发现,同胞的学业表现存在着极强的溢出效应,年长同胞的标准化得分每增加1分会引起年幼同胞测试分数增加超过10%。<sup>[18]</sup>巴基斯坦的研究同样发现,学习成绩较好的年长同胞能够更好地激励弟妹妹,进而提高了他们的学业表现。<sup>[19]</sup>可见,同胞的教育发展可以通过角色塑造或社会促进作用影响弟妹妹的学业表现,这是为何兄弟姐妹之间在教育结果上通常比较相似的一个重要原因。<sup>[20]</sup>

在我国,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活共同体,长期以来一直推崇整体性发展策略,形成了代际与代内并重的家族伦理观念。这一家族伦理要求个体对包括同胞在内的家族、家人具有尽责帮助的道义,社会也对同胞组内部的帮助与支持有极强的认可度。<sup>[21]</sup>已有研究更关注同胞之间在经济资本上的资金支持,而较少关注同胞间交流互动所致的这一更为隐蔽的结果。实际上,年长的同胞能够凭借自身年龄优势和教育的先行优势,通过对年幼同胞的学业辅导、学习方法分享,实现代内同胞间的文化知识传递,有利于提高年幼同胞的受教育水平。<sup>[22]</sup>互动过程中,在年幼同胞受益的同时,年长同胞也可以通过辅导年幼同胞的学习过程而获得“教学收益”。<sup>[23]</sup>这也说明,互动交流所产生的资源支持在同胞中并不仅仅是单向的,或者说不只体现在兄姐对弟妹的“大带小”中,也体现在弟妹

对兄姐的“小反哺大”中。代内帮扶伦理的存在将家庭中的同代人转化为彼此成长中的资源支持者,而不仅仅是资源的竞争者,使得某些家庭出现多位大学生的现象在国内层出不穷。<sup>[24]</sup>这也是个体经常提及兄弟姐妹在其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原因。<sup>[25]</sup>显然,与同胞同住在家中经由同胞的交流互动产生了新的资源,也加强了资源传递的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与同胞同住能够显著提升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么,与同胞同住提升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因果过程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与同胞同住有助于在家庭内部生产与传递更多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而家庭资源的有效供给则提高了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众所周知,家庭是青少年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在与自身努力息息相关的同时,也与家庭资源密切相关。在社会学中认为家庭资源禀赋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此后,科尔曼将家庭资源分为了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并认为这些资源的多寡都深刻影响了个体的教育。<sup>[26]</sup>布迪厄则首次将文化资本也纳入了家庭资源禀赋中,并认为文化资本对教育机会分配有重要影响,更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学业表现。<sup>[27]</sup>如前文所述,同胞不仅是家庭资源的竞争者,也是家庭资源的生产者与传递者。有研究已经系统分析了同胞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村大学生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并系统探讨了这些资源在促进教育获得中的因果机制。<sup>[28]</sup>遵循这一研究逻辑,我们将从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展开探讨。

文化资本表现为教育期望、课外知识、学习技巧等方面的再生产模式,主要通过家庭内部的文化熏陶来发挥作用。<sup>[29]</sup>从家庭文化资本来看,与同胞共同居住,有助于青少年获得各类文化资本,如年长的同胞能利用他们对学校文化的了解和较弟弟妹妹更丰富的经验,帮助弟

妹妹更快更好的适应学校的教学模式、学习技巧、文化表征,<sup>[30]</sup>也有利于共同学习习惯和氛围的养成,这提高了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含量。与同胞共同居住在一起,可以共享同胞的书本等文化产品,也可以在同胞的带动下,参观博物馆或者其他的文化活动,这也增加了客体化的文化资本含量。

家庭内部的社会网络涵盖代际关系和代内关系。多子女家庭中,共同生活的同胞数量的增加直接扩大了家庭内部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这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具有重要的影响。<sup>[31]</sup>除同学、朋友等外,同胞的代内关系对青少年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设想某一个兄弟姐妹认识了一个朋友,此时,这个朋友就成为这位青少年的潜在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青少年与兄弟姐妹在日常生活、学习等方面的交流、沟通、合作乃至竞争,<sup>[32]</sup>在家庭内部开辟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因为对于就读初中阶段的青少年而言,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其依恋对象逐渐开始从父母转向与他们一起学习、玩耍的同伴,<sup>[33]</sup>兄弟姐妹显然是其中重要的一份子。家庭代内的社会资本就会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这集中于以下三个层面。<sup>[34]</sup>首先,家庭内有多个孩子共同居住时,可以为家长提供更多有关青少年的异质性信息,这些信息为亲子之间的有效互动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契机,进而改善亲子之间的互动模式。其次,来自其他子女的濡染和竞争会增加父母对子女的成就期望,提升了父母与青少年的互动频率。再次,父母与同胞也可以对青少年进行共同监督,强化对青少年的正面引导,提升学习成绩。此外,与同胞居住在一起,在发生代际冲突时,青少年可以从同胞那里得到近距离的关爱和呵护,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情绪发泄和倾诉的渠道,有助于缓和代际矛盾,提高家庭互动频率和水平。<sup>[35]</sup>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与同胞同住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的中介机制。与同胞同住显著提升了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而

提高了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由于来自不同家庭的青少年受到的代际资源约束并不一致,同胞代内资源的拥有量和重要性很可能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使得与同胞同住的正面效应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异质性。从家庭资源的角度而言,父辈所具有的各类家庭资本的富裕或者匮乏直接决定了青少年教育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情况,进而产生相应的教育后果。这意味着对于那些优势阶层而言,由于父母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子女在教育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比较小,<sup>[36]</sup>子代能够从父辈处获得相对足够的资源。譬如,优势阶层能够利用其经济资本优势,在升学和择校的过程中减少竞争烈度,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竞赛之外,甚至垄断优质的教育机会。<sup>[37]</sup>受过较高教育的优势阶层父母,更有能力也更偏好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拥有更优的教育理念和抚育技巧,也更有时间并更愿意花时间陪伴子女和参与子女的各类活动,能够传递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sup>[38]</sup>与此相对,在劣势阶层之中,父母对子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有限,投入的意愿也不强,也更易于做出中断教育的决策。<sup>[39]</sup>而且,劣势阶层的家庭由于资源有限,青少年与其同胞处于直接竞争的关系中,有更大的可能会加剧同胞间的紧张关系,降低同胞间的支持行为,抑制交流互动的效果。总之,与劣势阶层背景的青少年相比,优势阶层的青少年享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同胞组内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存量相对更多,同胞间关系较少受到家庭资源约束的负面影响,学业表现更好,文化程度更高,同胞有能力也有意愿进行辅导,当这些同胞同住生活时,基于互动交流、学业辅导等进行的资源生产与传递的效果自然也会更好。进而,我们预期与同胞同住的效应会受到社会阶层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故提出以下一组假设。

假设3.1: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与同胞同住对农村青少年学业表现的正面影响要小于

城市青少年。

假设3.2: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与同胞同住对父亲为非精英职业的青少年学业表现的正面影响要小于父亲为精英职业的青少年。

假设3.3: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与同胞同住对父母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少年学业表现的正面影响要小于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少年。

###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 (一) 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在2013—2014学年收集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简称为CEPS)基线数据,这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的以青少年教育为主题的数据。首先根据各个县级单位(县、区、市)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比例两个变量进行分层,在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作为调查点;其次,以学校为抽样单位,在入选的28个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112所学校;再次,使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了初一和初三年级中的438个班级,这些班级的所有学生都进入样本。在2013—2014学年的基线调查中共调查了19487名学生。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户籍与流动、成长经历、身心健康、亲子互动、在校学习、课外活动、与老师/同学的关系、社会行为发展等多方面的信息,同时也询问了班主任、任课教师、学校领导、家长等方面的数据。本研究关注的核心现象是与同胞同住,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将明确回答自己有1个及以上同胞的青少年纳入,共计有10732名。

需要说明的是,该数据收集的时间距今已有一段时间,但仍然是适合本研究的数据,主要理由如下:第一,CEPS数据收集和清理过程中采取的质量控制措施,具有高水平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学界公认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高质量数据;第二,从该数据发布至今,国内还未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时效性更强的数据集,即便过去了较长的时间,仍有很多学者使用该数据进

行研究并发表成果,并且相关研究成果也被广泛接受;第三,从交流互动论等理论视角来看,本文所探讨的与同胞同住对学业表现的影响这一主题在长时间跨度内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并不依赖于特定时间点的数据,使用稍旧一些的数据并不影响研究结论对当前现象解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 (二) 变量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因变量是调查对象的学业表现。CEPS获得了每个学生语文、数学和英语的期中考试成绩,不过,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学校的学习内容、考试难度等存在差别,直接用这一成绩衡量学业表现会有较大误差,研究借鉴吴愈晓等人的方法,将学生的认知能力测试得分、三科期中考试成绩和三科主观学习能力三个指标来测量学业成就,并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其标准化为一个取值在0~100的变量,限于篇幅,具体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sup>[40]</sup>核心自变量为是否与同胞同住,CEPS数据在询问青少年与哪些家庭成员同住和与哪些家庭成员不同住这两个问题时均涉及同胞,对于是否与同胞同住使用了是否与同胞同住,这表明对于有2个及以上同胞的青少年而言,存在于部分同胞同住又与部分同胞不同住的现象,本研究主要探讨同胞的交流互动在学业表现上的溢出效应,而不关注不与同胞同住的结果,因此根据学生问卷中的青少年的回答情况,将只要有与同胞同住现象的情况的就值为1,不同住的赋值为0。中介变量是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还是参照吴愈晓等人的做法,使用家庭的文化资源(藏书和文化设施)以及家庭参与文化活动(参观博物馆和阅读)的频率进行测量。其中,家庭文化资源包括家庭的藏书情况和文化设施情况。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对二级指标提取公因子,在标准化后得到一个取值范围为0~100的变量。家庭内的社会资本,特指家庭内的亲子互动关系,如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对子女的监督、学业指导等。<sup>[41]</sup>基于这一定义,

研究使用父母与子女的互动频率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CEPS询问了青少年与妈妈、爸爸关于“学校发生的事情”“你与同学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情”“你的心事或烦恼”5个指标的交流状况,每个指标变量均为三分类,从1到3表示交流越来越频繁。研究将其加总得到一个社会资本的测量值,越大表示亲子互动频率越高。

控制变量包括三组。第一组是学生个体的基本人口特征,包括年级、性别、民族、户口属性,这几个变量都被处理为虚拟变量,其中年级变量中将九年级赋值为1,七年级赋值为0;性别变量中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户口变量中农业户口赋值为1,非农业户口赋值为0。第二组是同胞结构变量,其中同胞数量变量将大于5个同胞(不包括自己)的统一赋值为5,取值范围为1~5;出生顺序变量根据青少年出生排行归为三类:排行最大、排行中间和排行最小。第三组是家庭背景变量。包括家庭经济情况、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变量、父亲职业、父亲党员身份、父母教育期望、与父母同住。其中家庭经济情况根据家长和学生的回答,将其从非常困难到很富裕分为5个层次,赋值为1~5,为简化模型,近似的作为定距变量纳入模型。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变量则是将学生父亲和母亲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进行比较并取其中较高的值,此后再将这一变量转化为连续性的受教育年限变量。父母教育期望也是一个类似于受教育程度的定序变量,同父母教育年限同样操作,转化为连续变量。父亲职业在问卷中归为10类,为研究的方便将其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等4类归为精英职业,赋值为1,其他普通职业赋值为0。父亲党员身份变量被操作化为虚拟变量,将党员赋值为1,非党员赋值为0。与父母同住可能会混淆与同胞同住的效应,文中控制了与父母同住的变量,由于与父母一方同住或者不与任何一方同住的青少年数量较少,研究中将其合并为一类,赋值为1,与父母双方同住赋值为0。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学业表现	45.30	14.53	0	89.20
与同胞同住(是=1)	0.72	0.45	0	1
文化资本	45.26	23.90	0	100
社会资本	18.57	5.90	0	30
年级(九年级=1)	0.47	0.50	0	1
性别(男=1)	0.48	0.50	0	1
父母教育期望	16.65	3.31	9	22
户口类型(农业=1)	0.71	0.45	0	1
户口登记地(本县区=1)	0.79	0.41	0	1
同胞数量	1.33	0.67	1	5
出生次序	1.94	0.95	1	3
家庭经济情况	2.72	0.64	1	5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	9.75	2.53	0	19
父亲职业	0.27	0.45	0	1
父亲党员身份	0.07	0.25	0	1
与父母同住	0.27	0.44	0	1

### (三) 方法

数据分析包括四步。第一步是描述统计,了解青少年与同胞同住的基本情况。第二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CEPS是一个青少年嵌套于学校的分层数据结构,考虑到国内不同学校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异质性,而且学校层面的多个特征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研究中选择学校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以控制学校特征的影响。在多元线性回归之后,使用了替换自变量和匹配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三步,使用经典的中介效应分析三步法,探究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间的作用机制。接着,采用KHB中介效应检验法,探究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总效应、直接效应以及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大小,并确定中介效应的比例。第四步则在前一阶段所建立的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分社会群体进行异质性分析,以检验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不同影响。

## 四、分析结果

### (一) 与同胞同住的基本现状

统计数据显示,在拥有同胞的青少年中,27.7%不与同胞同住,72.3%与同胞同住在一

起。这说明,在人口大流动的时代,家庭的居住安排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体现在同胞组内部,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没有能够与同胞居住在一起。分户籍状况来看,非农业户口的青少年与同胞同住的比例为71.5%。农业户口的青少年与同胞同住的比例为72.7%,卡方检验表明两者的差异不显著,即与非农业户口的青少年相比,农业户口青少年与同胞同住的比例是没有差别的,说明这种大量同胞分居的居住安排在城市和农村都较为普遍,详见表2。

表2 分户籍状况青少年与同胞同住情况(%)

与同胞同住	非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	总体
否	28.5	27.3	27.7
是	71.5	72.7	72.3
合计	3056	7506	10490

### (二) 与同胞同住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研究中我们建立了一个以学业表现作为因变量的嵌套固定效应模型(见表3)。首先将年级、性别、父母教育期望、户籍类型、户口登记地、同胞规模、出生次序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年限、父亲职业、父亲党员身份等作为控制变量建立模型1。从模型1中可见,年级、性别、父母教育期望、同胞规模、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年限这几个变量对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其它变量的效应则不显著。具体而言,年级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在得分上七年级要比九年级高4.72;年级性别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在得分上女性要比男性高3.22。父母教育期望显著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父母教育期望每提高一年,学业表现得分就增加1.09分。在同胞结构变量上,同胞规模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同胞规模每增加一个,学业表现得分降低0.69。在家庭背景变量上,家庭经济状况对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情况每提高一个层次,得分相应提高0.91;父母受教育年限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父母的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得分提高0.34。

在模型1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青少年是否与同胞同住的核心自变量,构成了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的影响几乎保持不变,自变



量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显著,和那些不与同胞同住的青少年相比,与同胞同住的青少年在学业表现得分上要高1.26,假设1得到了证明。

表3 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年级(九年级=1)	-4.72*** (0.24)	-4.77*** (0.24)	-4.72*** (0.24)
性别(男=1)	-3.22*** (0.25)	-3.17*** (0.25)	-3.11*** (0.25)
父母教育期望	1.09*** (0.04)	1.08*** (0.04)	1.07*** (0.04)
户口登记地(本县区=1)	-0.62 (0.38)	-0.61 (0.38)	-0.56 (0.38)
户籍属性(农业=1)	0.44 (0.30)	0.41 (0.30)	0.38 (0.30)
同胞规模	-0.69** (0.23)	-0.70** (0.23)	-0.69** (0.23)
出生次序(排行老大为参照)			
排行中间	-0.84 (0.52)	-0.71 (0.52)	-0.71 (0.52)
排行最小	-0.23 (0.26)	0.10 (0.27)	0.20 (0.27)
家庭经济情况	0.91*** (0.20)	0.83*** (0.20)	0.87*** (0.20)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	0.34*** (0.06)	0.35*** (0.06)	0.35*** (0.06)
父亲职业类型(精英=1)	0.41 (0.28)	0.40 (0.28)	0.39 (0.28)
父亲党员身份(党员=1)	0.21 (0.48)	0.22 (0.48)	0.19 (0.48)
与同胞同住(同住=1)	-0.38 (0.29)	1.26*** (0.28)	1.98*** (0.27)
与同胞同住(家长回答,同住=1)			1.98*** (0.27)
常数项	26.61*** (1.12)	26.01*** (1.15)	25.41*** (1.15)
组间变异	6.96	6.97	6.97
组内变异	11.38	11.36	11.34
N	9361	9223	9181
R <sup>2</sup>	0.157	0.158	0.162

注:(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2)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使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第一是使用父母对青少年是否与同胞同住的回答。在回归模型2中,本文使用的是学生问卷中对是否与同胞同住的回答。在稳健性回归中,则替换成父母对青少年是否与同胞同住的回答。经过使用与回归模型2相同的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见模型3, OLS估计显示

与同胞同住变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为1.98,说明了与同胞同住变量影响的结果是稳健的。第二是使用匹配方法。在是否与同胞同住和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的关系研究中,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仍可能一定程度存在自选择效应或遗漏变量问题。例如,有的青少年家庭条件好,更易于与兄弟姐妹同住,同时他们的学业表现也强。为了降低选择偏误,本文再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进行检验。该方法基于反事实分析框架,将倾向值得分靠近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个体相匹配,计算得到平均处理效应。研究中采用最近距离匹配、卡尺匹配(r=0.1)、核匹配3种匹配方法。在匹配后进行的共同支撑检验显示,除了在右端有轻微的不重叠外,其余部分都落在共同区间。匹配后使用图形进行的平衡性检验显示,倾向值得分的核函数图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几乎完全重合,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各个混淆因素上都能够达到平衡。最终结果如表4所示,在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之后,与同胞同住的净效应仍然显著为正,这说明基本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4 匹配检验结果

变量	最近距离匹配	倾向值1:1匹配	倾向值卡尺匹配
与同胞同住	1.211** (0.361)	1.323*** (0.022)	1.324*** (0.022)

注:(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2)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 (四) 中介效应分析

接下来,研究探讨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影响的形成机制,即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这两个变量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者说,在控制了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后,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影响的变化情况。

研究基于经典的中介效应分析三步法,首先分别以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模型4和模型5,前一个模型的结果显示,与同胞同住显著影响家庭文化资本,后一个模型的结果同样显示,与同胞同住显著影响了家庭社会资本,这说明,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紧接着,我们以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为因变量,将自变量、中介变量



和控制变量放入建立模型6,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家庭的社会资本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个中介变量的情况下,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从模型1.26下降为1.13,自变量效应的下降说明中介效应是成立的。

表5 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影响的中介机制

	模型(4) 文化资本	模型(5) 社会资本	模型(6) 学业表现
与同胞同住	1.20** (0.46)	0.42** (0.14)	1.13*** (0.29)
文化资本			0.03*** (0.01)
社会资本			0.25*** (0.02)
控制变量		略	略
常数项		略	略
样本量	9223	9398	9223
R <sup>2</sup>	0.105	0.030	0.173

注: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差。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进一步对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具体检验中使用的是KHB中介效应分解方法,结果如表6所示,中介效应检验中,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影响的直接效应为1.24,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间接效应系数为0.16,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我们将间接效应的系数除以总效应的系数计算得到中介的比例约为12.57%,其中,文化资本中介的比例约为3.25%,社会资本中介的比例约为9.33%。

表6 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分解

婚姻缔结追求	最近距离匹配 系数	倾向值卡尺匹配 标准误
总效应	1.24***	0.296
直接效应	1.08***	0.296
间接效应	0.16**	0.046
遮蔽比例	12.57%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 (五) 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将进一步分析多子女家庭中,青少年与同胞同住对其学业表现的影响在不同阶层的异质性,以检验与同胞同住对来自于优势阶层背景的青少年还是劣势阶层背景的青少年更为有利。根据研究设计,我们用青少年的户籍、父亲职业地位和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测量阶层背景。因此,研究在表3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

加入与同胞同住和学生户籍属性、与同胞同住和父亲职业地位、与同胞同住和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建立了模型7、模型8和模型9(见表7)。回归结果表明,在这三个模型中,与同胞同住的主效应都是显著的,而三组交互项的系数分别为-0.93、-0.11、-0.35,但都是不显著的,这说明,与同胞同住对学业表现的效应在城市青少年和农村青少年之间、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少年和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少年之间、父亲从事普通职业的青少年与父亲从事精英职业的青少年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别,即与同胞同住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并不会随着户籍、父亲职业地位、父母教育程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积极影响不存在阶层差异,假设3的三组假设均不成立。

表7 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年级	-4.77*** (0.24)	-4.77*** (0.24)	-4.77*** (0.24)
(九年级=1)			
性别(男=1)	-3.17*** (0.25)	-3.17*** (0.25)	-3.16*** (0.25)
民族(汉=1)	1.08*** (0.04)	1.08*** (0.04)	1.08*** (0.04)
户口登记地 (本县区=1)	-0.61 (0.38)	-0.61 (0.38)	-0.61 (0.38)
户籍属性 (农业=1)	1.08* (0.53)	0.41 (0.30)	0.41 (0.30)
同胞规模	-0.68** (0.23)	-0.71** (0.23)	-0.70** (0.23)
出生次序	.	.	.
排行中间	-0.71 (0.52)	-0.72 (0.52)	-0.71 (0.52)
排行最小	0.10 (0.27)	0.10 (0.27)	0.10 (0.27)
家庭经济情况	0.83*** (0.20)	0.83*** (0.20)	0.83*** (0.20)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	0.35*** (0.06)	0.42*** (0.09)	0.34*** (0.06)
父亲职业类型 (精英=1)	0.41 (0.28)	0.40 (0.28)	0.66 (0.53)
父亲党员身份 (党员=1)	0.24 (0.48)	0.22 (0.48)	0.22 (0.48)
	0.02 (0.31)	0.02 (0.31)	0.02 (0.31)
与同胞同住 (同住=1)	1.93*** (0.52)	2.34* (1.07)	1.36*** (0.34)
与同胞同住×户籍属性	-0.93 (0.60)		

(续表)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与同胞同住×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		-0.11 (0.11)	
与同胞同住×父亲职业			-0.35 (0.61)
常数项	25.48*** (1.20)	25.26*** (1.35)	25.94*** (1.16)
组间变异	6.975	6.962	6.965
组内变异	11.358	11.359	11.359
N	9223	9223	9223
R <sup>2</sup>	0.193	0.194	0.194

注：(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2) 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 五、结论与讨论

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2013—2014年的数据, 基于教育发展中的同胞支持效应的新视角, 研究考察了青少年与同胞同住对其学业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 第一, 在人口大流动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青少年与同胞不同住的比例大大增加, 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 这说明青少年与同胞不同住行为已经比较普遍, 且这一现象在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中没有差异, 这值得引起重视。第二, 青少年是否与同胞同住对他们的学业表现有显著的影响, 控制其他因素之后, 与同胞同住的青少年比那些没有与同胞同住的青少年在学业表现得分上要高。通过更换自变量的测量指标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进行检验, 发现这一影响是稳健的。第三, 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与同胞同住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的中间机制, 与同胞同住有助于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与传递, 进而提高了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第四, 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不存在阶层差异。具体而言, 在农业户口、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父亲从事普通职业的劣势阶层背景的青少年与非农业户口、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和父亲从事精英职业的优势阶层背景的青少年相比, 与同胞同住对学校表现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劣势。

已有的同胞结构与教育发展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 但遗憾的是, 这些研究在大多数情况

下都被拉回到资源稀释理论的框架中, 基于对家庭代际资源的竞争来解释兄弟姐妹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本研究认为, 同胞不仅仅是家庭资源的竞争者, 也可以成为家庭资源的生产者与传递者, 对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而言, 家庭资源不仅只来自父母, 或者说不仅仅是外生的和一成不变的, 实际上, 兄弟姐妹作为重要的代内关系也可以为青少年生产和传递诸多关键的资源或支持, 包括代内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由于兄弟姐妹共同居住在一个物理空间时, 互动的频繁程度增加, 情感联系增强, 从而产生了更加有利于个体发展的社会资本, 与此同时, 兄弟姐妹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传递也会更加直接、更加迅速。甚至于, 共同居住的兄弟姐妹还可以作为父母与个体之间家庭社会资本的“中继器”间接影响青少年的教育获得。因此, 本研究所揭示的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教育获得的效应从侧面证实了同胞的教育支持效应, 这意味着教育获得的同胞之间既存在竞争效应, 也存在支持效应。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可以成为个体改善自身教育发展乃至生活际遇的重要资源的事实, 有助于缓解育龄人口及其家庭在做出是否继续生育第二个或第三个子女的决策时对子女未来的焦虑, 这就为“全面三孩”政策实施后多子女家庭的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传统社会中, 一个家庭的成员大多是同居共财生活在一起的, 这意味着兄弟姐妹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理空间范围之内。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加速, 家庭分居现象已经变得十分常见, 这种分居不仅表现在父母外出而子女留守老家, 也表现在家庭中的多个子女也被分隔于不同的地理空间, 以至于一家分割两地的“一家两地”乃至一家分割三地的“一家三地”现象越来越突出。这说明, 在人口大流动的当代中国, 与同胞同住的居住安排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 在这种情形下, 探讨与同胞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显示, 在多子女家庭中, 与同胞

同住的青少年在代内资源的加持下,其学业表现显著提高。这提醒党和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家庭的整体性迁移策略,以促进家庭化迁移的实现;同时,也提醒多子女家庭在青少年的养育中,应维持所有子女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居住格局,这有助于兄弟姐妹代内资源的生成和传递,对青少年的教育获得乃至今后的社会流动具有积极后果。

当然,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一是在考察同胞结构对教育发展的效应、理解家庭结构对青少年的生活际遇及地位获得时,强调了代内居住安排及其资源生成对青少年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数据限制,研究使用与同胞同住这一变量间接测量了同胞组内部的资源生成和资源传递过程,这无法直接检验学业表现中的同胞之间相互支持和帮助的效应。二是研究认为与同胞同住对学业表现的效应主要来自同胞交流互动和资源补充所致,然而,上述作用可能受到同胞组内的年龄差距的影响,由于所使用的数据未收集同胞的年龄信息,使得无法对出生间隔的影响进行检验。未来的研究应收集更多的同胞组内有关变量做进一步的讨论。

#### 参考文献:

- [1]BLAKE J. Family size and the quality of children[J]. *Demography*, 1981, 18(4): 421-442.
- [2]张克中,陶东杰,江求川. 中国农村子女教育同胞竞争效应研究[J]. *教育与经济*, 2013(6): 44-56.
- [3]张帆,吴愈晓. 与祖辈同住:当前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J]. *社会*, 2020, 40(3): 212-240
- [4]DOWNEY, DOUGLAS B. When bigger is not better: Family size, parental resource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60): 746-761.
- [5]DOWNEY D B. Number of siblings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e resource dilution explanation.[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6-7): 497-504.
- [6]加里·斯坦利·贝克尔. 家庭论[M]. 王献生,王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7]ZANJONC R B. Family configuration and intelligence[J]. *Science*, 1976, 192.

- [8]ZAJONC R B, MARKUS G B. Birth order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5 (82): 74-88.
- [9]郑磊,侯玉娜,刘叶. 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J]. *教育研究*, 2014(4): 59-69.
- [10]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1]吴炜. 有同胞总是不利的吗?——教育同胞效应的再认识[J]. *少年儿童研究*, 2024(3): 101-111.
- [12]张秀武. 同胞结构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 2020(4): 135-148.
- [13]聂景春,庞晓鹏,曾俊霞,等. 农村儿童兄弟姐妹的影响研究:交流互动或资源稀释?[J]. *人口学刊*, 2016, 38(6): 5-16.
- [14]郑磊,侯玉娜,刘叶. 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J]. *教育研究*, 2014, 35(4): 59-69.
- [15]CUTTING A L, DUNN J. Conversations with siblings and with friends: Links betwee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social understanding[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6, 24(1): 73-87.
- [16]陈斌斌,赵语,韩雯,等. 手足之情:同胞关系的类型、影响因素及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机制[J]. *心理学进展*, 2017(12): 162-172.
- [17]袁璐璐,罗楚亮. 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溢出效应[J]. *财经研究*, 2021(5): 15.
- [18]NICOLETTI C, RABE B. Sibling spillover effects in school achievement[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19, 34(4): 482-501.
- [19]QURESHI, JAVAERIA A. Additional returns to investing in girls' education: Impact on younger sibling human capital[J].*The Economic Journal*, 2018, 128(616): 3285-3319.
- [20]BENIN M H, JOHNSON D. R. Sibling similariti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 comparison of like-sex and cross-sex sibling pair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4(1): 11-21.
- [21]张晶晶. 现代家庭的伦理承载力——基于2017年全国道德调查的实证分析[J]. *道德与文明*, 2019(3): 92-98.
- [22]MILEVSKY A, LEVITT M. Sibling support in early adolescence: Buffering and compensation across relationships[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y*, 2005, 2(3): 299-320.
- [23]CHU C Y, CYRUS, et al. Effects of sibship structure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intrafamily resource transfer in Taiwan[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7 (2): 91-113.

- [24]齐燕. 家庭伦理视角下农村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基于甘肃会县高山村“大学生成窝”现象的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1): 21-28, 45
- [25]AALTONEN S. My mother thought upper secondary school was OK, but then my sibling said no”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he involvement of parents and siblings in their future choices[J].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016, 21(1): 65-76.
- [26]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S1): 95-120.
- [27]于冰洁, 余锦汉. 家庭文化资本、家长参与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20(1): 18-24, 30.
- [28]吴炜. 兄弟姐妹对农村大学生教育获得的积极影响研究——代内家庭资本的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12): 48-55.
- [29]孙猛, 王昶. 家庭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J]. 人口学刊, 2021, 43(5): 99-112.
- [30]HADD A R, RODGERS J L. Intelligence, income, and education as potential influences on a child’s home environment: A (maternal) sibling-comparison design[J]. Dev Psychol, 2017, 53(7): 1286-1299.
- [31]GUO G, LI Y, WANG H, et al. Peer influence, genetic propensity, and binge drink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a replic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5, 121(3): 914-954.
- [32]BUIST L K, DEKOVIĆ M, PRINZIE P.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sychopatholog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eta-analysis[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3, 33(1): 97-106.
- [33]刘莹, 郭瑞, 李文平. 什么影响了弱势职业阶层子女的学业成就——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的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 2021, 19(3): 54-60.
- [34]李黎明, 张骞. 代际网络与学业成就: 网络情境与个体能动性的双重视角[J]. 社会, 2022, 42(5): 207-240.
- [35]孙伦轩, 赖凯声. 亲子共餐与青少年学业成就及发展——基于倾向值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J]. 全球教育展望, 2018, 47(8): 113-128.
- [36]张兆曙, 戴思源. 中国农村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末孩优势”及其影响因素[J]. 人口学刊, 2018(5): 15-27.
- [37]李煜.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4): 97-109, 207.
- [38]郑磊, 祁翔, 侯玉娜.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 理论、方法与证据[J]. 社会发展研究, 2018(3): 177-202.
- [39]吴愈晓.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J]. 社会, 2012(4): 112-137.
- [40]吴愈晓, 黄超, 黄苏雯. 家庭、学校与文化的双重再生产: 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J]. 社会发展研究, 2017(3): 1-27.
- [41]朱新卓, 骆婧雅. 家庭资本与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基于江苏省B县初中后教育分流的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61(1): 152-164.

【责任编辑 史敏】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Living with Sibling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dolescents

WU Wei

**Abstract:** Based on the CEPS baseline survey dat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 of living with siblings on adolesc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nducte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ir group differences. I find that in the era of large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phenomenon of adolescents living differently from their compatriots in China has become more common. The results of the fixed effect model show that living with sibling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dolescents. Using the substitution variable method and matching method, it was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living with siblings on adolesc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robust.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re the mediating mechanisms of this influence. Living with siblings improve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enhancing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There is no class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living with siblings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dolescents, and children from disadvantaged classes do not have disadvantage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between sibling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d social mobility of adolescents, and social policies should be used to promote the overall migration of families.

**Keywords:** living with compatriots; residential arrangements; fellow structure; class background; academic performance